

第七卷
2009

亚洲 问题研究论丛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ISSUES
OF ASIA THE SEVENTH VOLUME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THE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LIAONING UNIVERSITY

辽宁大学出版社

第七卷
2009

亚洲 问题研究论丛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ISSUES
OF ASIA THE SEVENTH VOLUME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THE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LIAONING UNIVERSITY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问题研究论丛. 第7卷, 2009/辽宁大学亚洲
研究中心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10-6037-7

I. ①亚… II. ①辽… III. ①政治—亚洲—文集②经
济发展—亚洲—文集 IV. ①D730.0—53②F13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459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28mm

印 张: 9.75

字 数: 256 千字

出版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武 瑛

邓艳艳

封面设计: 邹本忠

徐澄玥

责任校对: 齐 悦

书 号: ISBN 978-7-5610-6037-7

定 价: 4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www.lnupshop.com>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亚洲问题研究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程 伟 金在烈

副 主 任 臧树良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凤才 李 平 宋有涛 邵晓光

杨 松 杨志安 胡玉海 唐晓华

高凯征 曹立华

执行主编 陆杰荣

中文编辑 刘毅荣 孙 薇 高斯扬

英文编辑 刘 萱

目 录

张兴国	东亚价值观何以可能.....	1
房广顺	李向楠 日本民族性与日本民族意识教育.....	9
王国富	论马克思社会发展视阈的形上追求	17
高玉平	从东亚民主化进程谈社会正义内涵	24
高 宁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的解决	31
周立星	如何构建东北亚安全与合作	39
李雪欣	高 杨 提莫兹·维达斯图斯 韩国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对我国利用韩资的影响	47
郭 舒	曹 宁 陈 艳 东北亚边境旅游联合开发研究 ——以图们江区域旅游开发为例	61
杨玉霞	财政预算管理政策在韩国自主创新中的作用	71
郭忠义	郑维臣 中韩经济奇迹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	79
刘向丽	孙红日 日本发展现代物流的经验分析	87
任 际	东北亚环境安全的国际法因素	94
曾祥瑞	佟连发 日本地方自治新思维解读.....	100
高岚君	国际法视野下的国际合作.....	106
刘大伟	地方化与民营化：中国法律与国际规则统一的两个内在动力.....	114
李 岩	比较视角下的中韩两国公司社会责任践行机制.....	127
祁洞之	巫祝文化的宗教形态 ——牛河梁先商遗存所见巫文化发生形态.....	134
赵彦昌	中国流失俄罗斯历史档案文献的追索研究.....	143

Contents

Zhang Xing Guo: Possibi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1
Fang Guangshun Li Xiangnan: Japanese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Japan	9
Wang Guofu: The Metaphysical Pursu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bout Marx's Opinion	17
Gao Yup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Eastern Asia System Modernization	24
Gao Ning: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Nuclear Issues in North Korea & Irap	31
Zhou Lixing: How to Construct the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and the Cooperation	39
Li Xuexin Gao Yang Vedastus • Timothy: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n China	47
Guo Shu Cao Ning Chen Yan: Joint Exploiting of Border Tourism in Northeast Asia—Tumen River Area as a Case	61
Yang Yuxia: The Function of Fiscal Budget Policy in Korean Autonomous Innovation	71
Guo Zhongyi Zheng Weichen: China and South Korea's Economic Miracl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79
Liu Xiangli Sun Hongri: An Analysis of Japan's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87
Ren Ji: International Law Factor of North-east Asia Environmental Safety	94
Zeng Xiangrui Tong Lianfa: Interpretation of New Ideas about Autonomy in Local Japan	100
Gao Lanju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106

Liu Dawei: Loc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wo Inside Incentive Factors for China Law's Integrity with World Standards	114
Li Y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ompanies in China and Korea	127
Qi Dongzhi: The Religions Form of the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Culture—The Original Form of Shamanism: A Study about NiuHeLiang Culture	134
Zhao Yanchang: Research on the Recourse of China's Historical Archives Losing to Russia	143

东亚价值观何以可能*

张兴国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摘要：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然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又使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因而“东亚模式”、“东亚价值（观）”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毁誉不一。笔者试图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以“和合”思想为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探讨建构东亚价值观可能性之根据、困境和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独立和谐、平等合作、共生共赢的建构实践原则。

关键词：东亚价值观 “和合”思想 建构原则

一、可能性之根据

首先，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与价值观的形成。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不同的文化（文明）最初是缘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是指与特定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文化是人们与不同的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分布在地球不同方位上的人们与特定地理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其中包括作为观念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分歧，其根本原因是两者在地理环境（物质生活条件）上的差异所致，东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对立，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如经济形式、生活习俗、政治制度）差异在观念上的反映。由于相同的原因，东西方内部形成不同的民族、国家，他们各自形成自己特定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东亚各国就是在相近的地理方位上形成了特有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进而生成了反映其特有的地理方位及其历史文化特性的价值观念（东亚价值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不同文化构成和反映不同

* 本文系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041018。

人的利益。换言之，同一文化则是人们共同的生活条件、共同利益的体现。在观念的层面上，利益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利益的表现。正是由于人类有共同利益，因而才有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惠共赢。在这个意义上，东亚价值观也是东亚各国人民在相近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利益的反映。

其次，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区域化”特征并存。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好、最有效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导致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不同地区、国家市场经济存在的方式和发展的模式是有所不同的。当前世界上已经存在和正在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共同体”证明了这一点，如“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以东亚为例，东南亚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通过东盟组织而进行整合，之后又形成中日韩加东盟的组织新格局。特别是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和洗礼，东亚各国进一步认识到联合起来抵御风险的重要性，将东亚的集体认同与联合行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1]这种以经济（利益）共同体为载体的“区域化”特征，说明市场经济的普遍推展必须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为基础。换言之，不同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是市场经济得以推展的路径或机制。“东亚价值观”就是市场经济在东亚国家得以推展的观念路径和机制，也因此成为“东亚模式”的观念核心。“全球化”趋势反映市场经济的“共性”，“区域化”特征反映市场经济的“个性”，“全球化”趋势与“区域化”特征并存正是体现市场经济发展的辩证性。

再次，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能消解文化的“多元化”生存。实际上，从经济角度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经济“一元化”即市场经济化，市场经济的确成为当今时代经济运行的基本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成为实现和推进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必由之路。文化（特别是观念文化）作为经济的反映被经济所决定；但一定的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发挥作用的特点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以传承，反过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才使人类在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共同道路上创造了不同的、多样化的实现模式。无论经济“全球化”还是文化“多元化”，都不是对经济和文化的价值判断，而是对一种客观实在的真实描述。二者之间不是相互消解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经济的共同性、依赖性）为多元的文化相互交流、借鉴、融通之可能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另一方面，“多元化”（不同文化的独立性、差异性）的文化也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提供了不同的但又可相互借鉴的实现路径和生成方式，也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全球化”的文化依据，正所谓“殊途”而“同归”是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特征，也是“东亚价值观”、“东亚模式”之合法性的又一理由。

最后，“儒学”：东亚国家割不断的“文化血脉”。由于地理的原因，东亚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东亚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与东亚国家的地缘环境有关，但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与以儒学为共同的文化血脉分不开。英文中 culture（文化）一词，在拉丁文中的原意就是“栽培”、“养育”的意思。由此可以这样来理解地理环境、文化和人的关系：不同的地理环境“栽培”、“养育”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栽培”、“养育”了不同的人。因此从基于地理因素所形成的文化范式、范围来看，象征东方世界的古代文明大致可以划分为中国、印度、阿拉伯伊斯兰三大文化圈。中国文化圈也称之为儒家文化圈，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属于这个文化圈。东亚国家受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其历史文化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特别是中国宋代儒学影响尤为明显，具体地说，东亚价值观念体系是以受中国宋代儒学影响的东亚儒学为根基的。^[2]这一点可以从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历史演变中得到验证，也体现在作为东亚主要国家的日本、韩国、中国在迈向近、现代化之初提出的文化发展策略上：“和魂洋才”（日本）、“东道西器”（韩国）、“中体西用”（中国）等。可见，东亚儒学是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它作为一种传统是无法摆脱的，作为一种力量必然要发挥它特定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海德格尔所意识到的那样：“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①从这一点看，东亚儒学既是东亚国家现代化实现和现代东亚价值观建构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是它不可舍弃的观念基础和思想资源。

二、可能性之困境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建构东亚价值观面临的基本困境。

首先，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形式和民主政治制度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虽然不能说它们是西方文化的专利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属于全人类，但它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反映着西方社会文化的特质。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移植”到东方（儒家）文化这片沃土中能否生

^① 《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05页。

根、开花、结果，关键要看儒家文化能否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如何相适应，决不能做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反过来去适应传统儒家文化那种“削足适履”的蠢事。那么，儒家文化是否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要求基本一致，学术界意见不一，但肯定其中有不一致的成分或方面，这一点是能够取得共识的。这种不一致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儒家文化注重整体一致，市场经济强调个人独立；儒家文化重义轻利，市场经济更看重现实的功利效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要求分散决策、民主行政，儒家文化主张集中（家长式）决策、一元化（专制式）行政；蕴涵、贯穿于以上几方面的矛盾概括起来就是个人与群体、理性与感性、法制与仁爱之间的矛盾，是“东亚价值观”的构建必须面对并正确解决的基本矛盾。

其次，儒家文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博弈”。虽然经济全球化不能直接导致文化的一元化趋同，但它的确带来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的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汇通。儒家文化也必须在与其他文化（文明）的比较、竞争、博弈中来确证自己的存在合法性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的正当有效性。对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及儒学与其他文化关系的评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历来褒贬不一，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展开和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关儒学的话题仍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的争论和探讨也必然会继续下去。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东亚价值观’（它的内涵、必要性和必然性等）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无法回避。

再次，儒家文化与现代东亚国家。东亚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的趋势是“弱化”而不是强化，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自身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这里着重指出几点：一是从文化的历史性看，儒家文化是自然经济、封建制度的文化样式。在东亚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欧风美雨大量涌入，儒家文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东亚国家面临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文化摄取源，这期间在日本有人提出“脱亚入欧”，也有人主张“和魂洋才”；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在有选择地得到延续的同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日本的殖民文化等其他外来文化，也对韩国的经济腾飞、政治变革和文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令人担忧、值得关注。二是从文化的区域性看，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儒家文化的“母体”，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不能不带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质。它作为被移植的外来文化只有与接受国的民族本土文化相融合，与其他外来文化相

协调才能发挥作用。正如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一样，东亚文化（价值）也决不等同于“中国化”。事实也正如此，东亚社会除受儒学的重大影响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各民族的本土文化，都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三是从文化的利益性看，“文化共同体”背后的根基是“利益共同体”。不同的文化体现和代表不同的利益，文化上的相同或相似反映的是利益上的同一或相近。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东亚各国的利益乃至文化有较多的相近和相似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的东亚社会（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文化类型）则呈现出较多的“异质性”，各个国家的利益要求也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超出了地理环境意义上的界限，利益多样化必然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那么，如何在多样、多元的利益主体之间“求同存异”，找寻利益“共同点”进而合力共建文化（价值）“共同体”，是摆在东亚各国人民面前的共同课题。

三、可能性之路径

构建东亚价值观面临复杂多样的矛盾和问题，根据与困境、机遇与挑战并存。概而言之，在历时性上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在共时性上表现为“西方”文化与“东方”社会的关系；在东亚国家内部表现为“经济”利益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儒家文化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本土文化的关系。其中，“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是带根本性的矛盾关系。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是我们应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去理解和认识这些矛盾关系，它直接关涉到东亚价值观的可能性、内涵本质以及如何建构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建构东亚价值观首先需要从哲学的高度以及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方法论奠基及其建构原则的厘定。

首先，东亚文化的性质决定东亚价值观的本质。从东亚国家的社会历史演进与现状结构分析看，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社会时空的多维性和多重性特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相“交织”、“西方”与“东方”相“交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交融”，使东亚文化呈现出“杂交性”特色。这就决定了对东亚文化以及东亚各国文化的研究，不是单纯对本土文化或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关系中某一方面的研究，对这种“杂交文化”的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应有不同于一般文化研究的特殊方法，这种方法在哲学的层面上就是“和合”的思想和方法。“和合”有两层含义：和而不同、转生合一，前者是指不同的事物可以和谐共生；后者是指不同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而融合为新事物。^[3]“和合”充分体现

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中差异和谐、冲突融合、多元互补的辩证性质。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既反对否定差异存在的抽象同一,也反对否定联系依赖的绝对二元对立。所以,“和合”应成为我们研究东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东亚各国文化之间关系、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乃至凡差异事物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和合”既是我们研究东亚文化、正确认识和解决东亚国家之间关系、建构东亚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也是东亚价值观的核心范畴。

其次,东亚价值观的本质决定其建构的实践原则。价值观是人在认识和行动领域关于某类事物是否“值得”的一种判定,是人们对某类事物是否有价值、具有何种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价值的根本看法。那么,如果把“和合”作为建构东亚价值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值得我们去想去做的是什么呢?换言之,“和合”作为一种价值观,它的本质要求我们在建构东亚价值观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下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独立、平等、共生的原则。就是要充分肯认和尊重每一种文化存在、传播、发展的经济必然性和道德合法性,承认各种文化之间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克服或取代另一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立、平等、共生的“权利”,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二是要坚持和谐、合作、共赢的原则。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就是主张不同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种族之间要和谐相处,而且还要学会欣赏对方“美人之美”,同时在此基础上积极进行合作交流,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进而达到相得益彰、互惠共赢、“世界大同”的结果和目的。前一条原则是原因性的,后一条原则是结果性的,两条原则的统一构成东亚价值观实践的总原则:独立和谐、平等合作、共生共赢。

再次,东亚价值观建构与儒学创新。人们的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经济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价值观念的转化。从以上所述可见,儒家文化对东亚社会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不远,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儒学对东亚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日渐衰微,而与现代化有着内在联系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则日见强势,儒学创新势在必行。拿日本、韩国来说,日本和韩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东亚国家,但近代特别是近些年来,日、韩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倾向呈现明显变化,以新的文化取向改变传统的意识观念和经济成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的共识实践。如日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文化要求,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了以结构改革为先导、以创新知识创新社会和文化智慧型社会取代传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战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向。韩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由于经济发展要求和对西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以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为主要形

式、以区域创新体系为基本动力的“儒家资本主义”，创造并实现了韩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面向 21 世纪，韩国提出通过技术手段的变革瓦解既存的传统文 化，通过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原则的新范式来取代习惯理性，积极倡导多元文化共处的经济合作机制等。^[4] 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命运、现代价值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长期实践检验的时代课题。

综上所述，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东亚价值观何以可能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自我”（self）和“他者”（other）的关系。不同的种族、文化之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等，都是互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本文认为构建东亚价值观应以张立文先生在“和合论”中提出的“五大文化原理”，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其文化精神和实践原则。以“和合”范畴所蕴涵的“和而不同、转生合一”的哲学理念，开放、宽容的人文情怀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和谐、平等合作、共生共赢的实践智慧为认识依据和行动指南，以正确发挥儒学在现代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中的应有价值，构建起与时俱进的、现代的东亚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 俞新天. 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从文化的视角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6).
- [2] 杨翰卿. 儒学与现代东亚价值观 [J]. 中州学刊, 2002 (1).
- [3] 张立文. 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 [J]. 中国哲学史, 1996 (1).
- [4] 朱根. 东亚模式的文化倾向及其前景 [J]. 日本学刊, 2003 (5).

Possibi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Zhang Xingguo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20th century, East Asia countries have been growing up with a fast speed which is so conspicuous. Howev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nineties made a threat to the East Asia countries. This East Asia model and values of East Asia attract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ttention and the scholars do the research on it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view. With the them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goal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y, the author adopts a harmonious way of

thinking to make a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difficulties and way of how to make up the possibilities of value of the East Asia. On the basis of this, we bring up the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and harmony, equality and cooperation, living and developing together.

Key words: values of East Asia; harmonious ideal; building principles

日本民族性与日本民族意识教育*

房广顺 李向楠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阳市铁西区委办公室)

内容摘要：日本的民族性与民族意识教育是众所关注的问题，对日本的民族性与民族意识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从更深的层次了解日本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本文从民族性的最基本内涵出发，解释了日本民族性的内涵、特点及其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日本的民族意识教育对于日本民族性从古至今的不断演变和最后的成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意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机制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日本民族意识教育是否能够给中国的民族意识教育提供一些借鉴，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关键词：民族性 民族文化 民族意识教育 民族观念

日本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浓重和民族观念极强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族，具有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作为一个具有千百年历史的民族来说，深刻的历史积淀逐渐地形成了其复杂的民族性格。而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民族性格的保持是离不开民族意识教育的。因此，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对于与日本民族性格息息相关的民族意识教育该如何去显示其特殊性和自主性，以及该如何保持民族的基本特性等方面而言民族意识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日本民族性的内涵、特点及社会历史根源

“民族性”又称“民族性格”、“国民性”等。“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为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共同拥有的各

* 本文系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7 年度课题《东北亚地区能源安全问题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061008。

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总和”，“民族性起的作用很广泛，不论哪一个人哪个群体的成员身上都深深地刻着民族性的烙印。民族越古老，历史越悠久，民族性格就越深沉、含蓄、执着”。^① 民族文化的积淀形成了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反过来又能影响着民族文化。

（一）日本民族性的特点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和逐渐积淀，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有别于世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民族性格正是日本的这种文化精神的外化表现。所谓“日本民族性”，就是指日本民族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并且在较长时期内出现的一种心理和性格上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在日本民族较长时间的社会活动中表现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方式。说其是“稳定的”，就是指日本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或现代文化向未来变迁的过程中，它们之间总是具有一种内在的割舍不断的联系。日本民族性不论是在文化、社会心理还是在其他层面上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1. 多元文化造就了日本民族的混合性与矛盾性

日本民族性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日本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发展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上。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一直注重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借鉴。然而，这种文化上的多元性造就了日本民族性格的混合性和矛盾性。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出版的《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她在书中认为：“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即保守又善于接受新鲜事务，而且这一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的。”^②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民族性往往在多个方面表现出典型的混合性与矛盾性的特征。

2. 神道教造就了日本民族的非理性

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土长的宗教，同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神道教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习俗、思想和制度的体系。神道教主张“神皇一体”，视天皇如神明，尊之为“天照大御神”的后裔。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

^① 孙利，佐斌：《心理学视野中的民族性格》，《高等函授学报》2003年6月第16卷第2期。

^② 〈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著：《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